

晚清史

戴鞍钢·著

复旦大学 教授

晚清百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内在变革要求与外来力量相遇，中华帝

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转型，艰难地

踏上近代民族国家之路。

作者戴鞍钢教授长期从事晚清史的教学

和研究，以史家之笔将这段纷繁复杂的

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本书内容全面，

结构清晰，使读者能很快对晚清史有一

基本了解；同时吸纳了学界最新研究成

果，为历史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细节。

本书每章末尾都附有参考书目与参考文

献，为读者深入学习提供了研究途径。



晚清史

戴鞍钢·著

复旦大学 教授



上海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史/戴鞍钢著.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80703-670-8

I. 晚… II. 戴… III. 中国-近代史-研究-清后期
IV. 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2593 号

书 名 晚清史

著 者 戴鞍钢

责任编辑 胡国友

特约编辑 师惟善

封面设计 夏侯政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上海百家出版社(www.bjph.net)

地 址 上海市瞿溪路 1365 弄 3 号(200032)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宝山杨中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20 000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300 册

ISBN 978-7-80703-670-8/K·137

定 价 38.00 元

上海百家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瑞富律师事务所

田原律师(13581917060)

商瑜律师(13501679328)

篇 首 语

从事教学研究多年,一直觉得晚清史可以尝试新的写法,争取读来让人有兴趣,耐回味。应该努力打破以往清代前后期分属中国古代、近代史范畴的格局,揭示其内在的密切联系。

本书的“引言”,即从1793年乾隆帝接见英国使臣说起。因为此前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因其与周边一些国家传统的藩属即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更自视强大,对其余的外部世界尤其是日益强盛的欧美国家漠视、无知;而另一方面,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影响至为深远的世界一体化历史进程,此后,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全球的持续扩张,除非有足够的力量抵御,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难置身事外,继续在自己原来的“世界”里生活。

落伍于世界发展潮流的专制统治,在各方面窒息了中国的生机,作为这种世界格局变化征兆的英国使臣的接连到访,并没有能触动中国自身做出些微改革以为应对,这种令人扼腕叹息的前奏,预示着多灾多难的晚清史的开场。

此后的中国,沉沦与奋起、屈辱与抗争并存,形势转换之快,新旧人物、思潮等兴替之速,前所未有。努力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中国,正是在这



样的历史氛围中孕育成长。为了再现壮阔的历史走向,本书尝试:

一、避免教科书式的沉闷写法,不要动辄罗列背景、原因、经过、结局、特点、局限、影响和历史意义等过分主观的诠释。

二、要有生动的有史料依据的事件、人物和其他历史场景的描写。

三、要有新的视角,尽可能反映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

四、要及时体现中外学术界新近的研究成果,包括新的史料和见解;并开列相关的论著和资料书目,略作推荐,供读者参考。

五、详略得当,以往论著叙述较详细的简写,留出篇幅揭示那些尚被忽略的纷繁史实,并以“知识框”的形式辅以一些背景知识的介绍,如人物传略、史事回眸、典章制度、官苑陵寝、史实考辨等。

当然,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但有想法并努力去做,总是好的。本书就是基于上述想法的一种尝试,成败得失,尚待读者诸君教正。

目 录

知识框目录	1
图片目录	1
 引言 山雨欲来风满楼	1
(一) 承德来了英国人	1
(二) 多事之秋的嘉道年间	9
 一、国门坍塌	17
(一) 行商、关税、鸦片	17
(二) 五口通商的波折	25
(三) 惊雷过后的沉寂	30
 二、“天京”对峙	35
(一) 客家人与太平天国	35
(二) 定都天京	40
(三) 征战与享乐	42
(四) 内讧与败亡	47
 三、督抚崛起	55



(一) 士绅与团练	55
(二) 湘军与淮军	60
(三) 督抚与幕府	66
 四、慈禧当政	70
(一) 北京沦陷	70
(二) 沙俄打劫	78
(三) 辛酉政变	81
(四) 同治与皇太后	86
 五、“中外和好”	90
(一) “借师助剿”	90
(二) 自强“洋务”	94
(三) 遣使与留学	104
(四) 对日外交	109
 六、狼烟又起	114
(一) 西北边陲	114
(二) 中法战争	119
(三) 东北亚战火	124
(四) 亡国的边缘	130
 七、戊戌风云	140
(一) 光绪的作为	140
(二) 变法的夭折	147
(三) 海外流亡者	152
 八、世纪之交	159



(一) 教民与民教冲突	159
(二) 义和团的斗争	164
(三) 世纪之初的重创	174
(四) 国民意识的呼唤	179
九、出路何在	186
(一) “新政”和“预备立宪”	186
(二) 革命力量的集结	196
(三) “君宪”与“共和”之辩	201
十、社会变动	206
(一) 经济的变革	206
(二) 文化的演进	215
(三) 城市的近代化	219
十一、风暴前夜	228
(一) 民众的行动	228
(二) 载沣父子的登台	234
(三) 请愿与暴动	245
十二、清帝退位	253
(一) 革命风潮	253
(二) 清廷的应对	258
(三) 帝制终结	261
余音 覆水难收	272
(一) 溥仪出宫	272
(二) 遗老遗少	277

知识框目录

避暑山庄	5
玉米和番薯在中国的传播	11
英国占据香港的三步骤	23
李秀成“自述”的真伪	52
清代的科举	57
令人惊叹的圆明园	75
清宫秀女的选拔	82
来华前的华尔	91
晚清日本在华间谍	125
光绪与珍妃	143
晚清的灾情	167
清末司法改革	194
清末全国体育运动会	224
慈禧和光绪的墓地	241
清代兵制	243
外蒙古的分离	267
紫禁城小记	273

图 片 目 录

图 1	早期运往海外的瓷器	2
图 2	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	6
图 3	被箭头射中的隆宗门匾额	13
图 4	1812 年的广州商馆	18
图 5	怡和洋行行商伍秉鉴(浩官)像	19
图 6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储藏室	20
图 7	林则徐(1785—1850)	21
图 8	虎门销烟池遗址	22
图 9	《南京条约》中英文本	25
图 10	1876 年的上海外滩全景	28
图 11	《海国图志》书影	32
图 12	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	38
图 13	《资政新篇》书影	50
图 14	绅士身份的获得以及绅士集团的构成	56
图 15	曾国藩(1811—1872)	60
图 16	李鸿章(1823—1901)	63
图 17	淮军	65
图 18	圆明园废墟	74
图 19	走在北京街头的法国士兵	77
图 20	奕訢(1833—1898)	78
图 21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门	90
图 22	戈登(1833—1885)	94



图 23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95
图 24	轮船招商局大楼	97
图 25	张之洞(1837—1909)	101
图 26	张謇(1853—1926)	102
图 27	郭嵩焘(1818—1891)	105
图 28	容闳(1828—1913)	107
图 29	留美幼童	108
图 30	严复(1854—1921)	109
图 31	左宗棠(1812—1885)	114
图 32	清舰“致远”号官兵(中为邓世昌)	128
图 33	李鸿章与俾斯麦	136
图 34	康有为(1858—1927)	140
图 35	梁启超(1873—1929)	141
图 36	光绪帝(1871—1908)	142
图 37	京师大学堂原址	145
图 38	谭嗣同(1865—1898)	148
图 39	袁世凯(1859—1916)	149
图 40	孙中山(1866—1925)	157
图 41	身穿中国服装的法国传教士	160
图 42	晚清的教堂	165
图 43	义和团团民	168
图 44	书写着“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旗帜	171
图 45	八国联军开进北京城	175
图 46	被焚毁的肃亲王府	176
图 47	瓦德西(1832—1904)	176
图 48	《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178
图 49	清末的留日学生	181
图 50	《国民报》	184
图 51	《江楚会奏变法折》	187
图 52	新军练兵处成员合影	188
图 53	《大清现行律例》书影	195
图 54	章太炎(1869—1936)	197

图 55	孙中山与部分同盟会会员合影	199
图 56	孙中山手书的同盟会十六字宣言	199
图 57	《民报》	200
图 58	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钞票	210
图 59	盛宣怀(1844—1916)	211
图 60	中国通商银行	212
图 61	唐胥铁路	213
图 62	1870 年的上海南京路	223
图 63	南洋劝业会正门大道	226
图 64	慈禧(1835—1908)	235
图 65	载沣(1883—1951)	240
图 66	袁世凯的步兵	245
图 67	第二次国会请愿代表合影	248
图 68	黄兴为七十二烈士所写的挽联	255
图 69	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	257
图 70	大总统誓词	265





引言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 承德来了英国人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皇帝已是83岁高龄,当政也已有58年。这年夏天,他正在距北京数百里外的承德避暑山庄消夏,手下人前来禀报,由英国国王派遣、远道而来的马戛尔尼使团已从北京启程,前来承德觐见。乾隆闻听,当即吩咐身边的宠臣、时任军机大臣和珅负责接洽,好生招待。

远隔重洋的英国,为什么要专门派使团水陆兼程,辗转前来觐见?乾隆的兴致又为什么这样高?原来英国人自称是奉命来向乾隆帝补行恭祝80寿辰的,得知来自远方陌生国度的使者如此谦恭有礼,向来注重威仪天下的乾隆自然不无得意。殊不知,真应了一句俗语“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风尘仆仆前来求见的英国人名为祝寿,其实另有打算,这就要从当时的中英贸易说起。

清朝初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特别是据守台湾的郑成功集团的反清斗争,清政府曾先后宣布严厉的“海禁”和“迁海令”,逼迫闽、广、江、浙等省沿海居民内迁50里,有越界者斩。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即下令开放海禁,允许商民出洋贸易,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中外贸易又趋活跃,其中广州尤为突出。

很早以来,广州就是华南地区重要的商港。“海禁”取消后,外国商人又纷至沓来,其中不少是英国人。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指令,正式在广州开设商馆,负责对华贸易的拓展。商馆最初由随船来华的英国商人临时组建,设有主席、司库、出口货物和入口货物主管。1770年后,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派来的代表取代。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此后通过武力先后强占了印度、新加坡和緬

甸的部分地区,并垄断了英国的对华贸易,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其商机,很大一部分来自当时欧洲人饮用中国茶的风尚。这种“中国风尚”的流行,是明末以来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中,通过传教士及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文明的阐释,以及中国文物在欧洲的广受青睐,而使欧洲人产生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想望。喝茶即是体现这种想望的方式之一。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产茶和出口茶叶,且价廉物美,故而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喝茶要用茶具,中国的瓷器随之畅销。到18世纪中叶,不单是上流社会喜好品茶,一般平民也都喝茶,有专门的茶店,也有人沿街叫卖泡好的茶水。1784年英国首相庇特估计,约有三分之二的英国人每年人均消费3磅茶叶。^①



图1 早期运往海外的瓷器

18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已经把对华贸易作为其东方贸易的主体。船只的数量激增,由最初的几艘增至二十余艘,最多时达34艘;船的吨位也不断加大,由500吨位以下,增至700吨位以上,最大者达922吨位。当时驶往中国的船只,堪称是英国最大型的商船,而同期航行大西洋的商船只有三四百吨位。

中国的瓷器不但体现了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完美结合,对于远洋商船来说,瓷器还具有压舱货的重要作用。由于它重量大,不怕受

潮,装载在船的底舱,既可防止茶叶、丝绸受损,又保证了商船的平稳航行。瓷器、丝绸和茶叶,是当时中英间海运货物的最佳组合。这也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对华贸易为英国提供了巨额的商业利润。东印度公司仅从茶叶贸易中就赚取了惊人的利润。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进口每磅茶叶的费用为2.4先令,运抵伦敦市场后的销售价则高达14.8先令。18世纪40年代,前者降至1先令,利润空间更大。^②

当时来华的英国商船,大多经马六甲海峡驶抵广州交易。据统计,从1685年

^①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27页。

^② 郭成康等:《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372、373、386、387页。



“禁海”令解除到 1753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共计 189 艘,其中广州 157 艘,占总数的 83%;厦门 17 艘,占 9%;舟山 15 艘,占 8%。1737 年至 1753 年的 16 年间,英国商船全部在广州锚泊。^①

随着中英贸易的推进和对中国了解的增多,英国人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广州,而是向北延伸,并聚焦于更靠近茶、丝产地的浙江宁波。1755 年 6 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乘船直驶宁波,为首的英国人汉语名字叫洪任辉,能说汉语,人称“中国通”。英国人的这种举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闽浙总督杨应琚奏称,浙江洋面的天险和防务均不如广东,江南财富重地,不能听任洋船自由出入,对外通商应限于广州一口。乾隆帝也认为:“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关系紧要。”^②遂于 1757 年(乾隆二十二年)宣布对欧美国家的贸易只准在广州进行,史称“一口通商”禁令。

清政府的举措,使旨在拓展中国市场的英国人大为扫兴,也很不甘心。1759 年,洪任辉受命乘船北上天津,要求清政府允许在宁波通商,并控告粤海关贪污勒索等弊端。英船竟然未经许可,径直驶抵距北京不远的天津海口,令清政府很震惊。为平息事态,一面派人押解洪任辉从陆路返回广州,一面着手调查洪任辉的控告。不久,查证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贪污属实,革职处分,洪任辉则以违例别通海关罪,遣送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回国。

针对英国人增开通商口岸的要求,清政府坚持广州一口通商的禁令,并加强了对广州外国商人的管束。1759 年,即洪任辉北上天津事发当年,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馆中,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兵弹压稽查。事态的演变,与英国人的期望大相径庭,失望之余,他们决意寻找机会,再作努力。

1787 年,英国政府曾派遣喀塞卡特出使中国,但他在途中病死,没能到达中国。1792 年,由东印度公司资助,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帝补祝 80 寿辰为名,派遣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赴华。马戛尔尼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曾先后出任英国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西印度石榴岛和托贝哥岛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和孟加拉总督。

使团的组成煞费苦心,最后挑选了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各方面的专家及卫士、仆役等共百余人。在寻找中文翻译时,碰到了难题。当时在英国找不到一个懂中

① 李国荣主编:《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九州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2 页。

② 《清高宗圣训》卷 281,第 5 页。

文的人,到广州后再找,也不合适,因为即使少数广州本地人懂得一些英文,但他们的外文知识只能为外国商人翻译一些商业买卖的对话,况且他们讲的粤语在北京也很少有人能听懂。几经周折,总算打听到在欧洲大陆意大利的神学院里,有几个来自中国的学生。这座神学院是由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创办的,他早年曾来华传教,并一度担任康熙帝的宫廷画师。后因清廷限制外国在华传教士的活动,返回意大利,并于1732年在那不勒斯创办了“中国学院”,旨在培养中国籍的神甫,继续在华传教。

受马戛尔尼指派的使团秘书,顶风冒险,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直接来到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如愿以偿找到了两位合适的中文翻译。他们是跟随外国传教士悄悄从中国来到意大利学神学的,已经学成正准备回国。有趣的是,他们能讲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却不懂英语,好在马戛尔尼和使团的不少人粗通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彼此能够沟通。既然再无合适的人选,使团秘书就带了这两位中国人返回英国,与使团会合。

使团的船队,引人注目。马戛尔尼及使团主要成员乘坐的“狮子”号,是当时英国海军的主力战舰,配备有64门大炮,以此来华,其用意无非是要借此炫耀英国的武力。随行的还有“印度斯坦”号和“豺狼”号,分别装载使团随员、礼品和给养。礼品有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地球仪、座钟、八音匣、玻璃镶金彩灯、羊毛挂毯和地毯、金色马鞍和马车,还有毛瑟枪、连珠枪、利剑、铜炮、榴弹炮及装备有110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模型。

为避免误会,使团动身前,英国政府特意派人在广州向两广总督正式递交文书,申明向乾隆帝补祝寿辰的来意,表示“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英王)陛下感到十分遗憾”,并说此次派出的“特使将携带英王陛下赠送贵国皇帝的一些礼物,这些物品体积过大,机器灵巧,从广州长途跋涉至北京,恐怕路上招致损伤,因此他将乘坐英王陛下特派的船只,直接航至距离皇帝所在地最近的天津港口上岸”,请求准许并提供帮助。^①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朴次茅斯港起航。经过9个多月的航行,于1793年6月到达中国的澳门。稍作休整,于6月20日驶离澳门前往天津。8月4日,驶抵天津。清政府事先已得到使团来华的禀告,乾隆帝对英国人的谦敬有礼十分高兴,吩咐沿途官员“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外人所轻”^②。有了这道圣旨,这些官员自然不敢怠慢。使团刚在塘沽海口锚泊,当地官员就带领7艘大号

①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② (英)马戛尔尼原著,刘半农原译,林延清解读:《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驳船送来了各类食品,其中包括 20 头牛、120 头猪、100 只鸡、100 只鸭、160 袋面粉、160 袋大米、14 箱馒头、10 箱茶叶、1 箱小米、10 箱白米、10 箱蜡烛、1 000 个西瓜、3 000 个甜瓜、22 箱桃干、32 箱蜜饯、22 箱干果、22 箱酱瓜、22 箱咸菜、40 篮冬瓜、1 000 个南瓜、40 捆新鲜蔬菜、20 担豌豆和 3 篓陶器。面对如此丰盛的馈赠,马戛尔尼惊呼:“供给之周至如此,而礼貌又优渥异常,恐世界各国之优待他国使臣者,多不能与此东方帝国比也。”^①他们也没有想到,此后根本不用开口,大量免费供应的物资会源源不断地送来。

从天津到北京,“一路供给之物,如酒肴蔬果之属,无不穷极奢侈,伺候之人亦能殷勤逾恒”^②。途中,使团成员有一次偶然表示要买一件物品,负责接待的官员立刻就去买来奉上,并无论如何不肯收钱,说是一切费用都记在皇帝的账上了。如此慷慨殷勤,连马戛尔尼也觉察到其背后有花样,认为这些官员欺上瞒下,从中大饱了私囊。使团成员巴罗记述:

在北京时,一个传教士告诉过我,《京报》登过一篇文章,宣扬皇帝对英国使团是如何的慷慨大方。他下旨说,使团驻扎北京和热河期间,每天开支不得少于 1 500 两银子。这位传教士同时断言,朝廷的高官,以及那些有幸被指派接待外国使节的其他官员,认为这是皇帝赐给他们的最上等的美差。朝廷的拨款扣除实际开支,等于一笔不小的横财。^③

到了北京后,马戛尔尼又率使团的一些主要成员赶往数百里外的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



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俗称离宫,是清朝康熙、乾隆、嘉庆皇帝避暑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其规模宏大、依地势起伏蜿蜒而建的宫墙,周长近 10 公里。山庄总面积 5.64 平方公里,约为北京颐和园的 2 倍,北海的 8 倍,稍大于圆明园(包括万春园、长春园的面积)。山庄外面还有附属的寺庙群,共占

① (英)马戛尔尼原著,刘半农原译,林延清解读:《1793 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 页。

② 同上书,第 44 页。

③ (英)约翰·巴罗著,李国庆等译:《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51 页。